

國家圖書館
自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CL-9901-008

年 度：99 年度

執行期限：2010.1.1-2010.12.30

計畫名稱：圖書館事業百年史：

以國家圖書館為中心探討國立圖書館變遷與發展之意義

研究人員：張圍東、黃文德、阮靜玲

本報告是否可公開發表：是

否 部分公開

目 次

圖表目次	I
摘 要	II
第 壹 章 緒論.....	1
第 貳 章 文獻探討.....	4
第 參 章 問題意識與執行方法.....	8
第 肆 章 研究結果.....	10
第 伍 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47
參考文獻	51

圖表目次

表 1、戰後國立五館執掌業務之比較表.....	26
表 2、國家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任務、組織對照表.....	43-44

摘 要

回顧晚清中國推動改革與提升知識的過程，一直到今日的臺灣，國立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與不僅是典藏與流通知識的重要機構，也是醞釀社會思潮動力來源之一。因此，本文以國家圖書館發展為中心，探究近代國立圖書館的發展，內容概分為近代化圖書館的啓蒙與國立圖書館的籌備（1860年代至1933年）、戰時建館與戰後國立五館的佈局（1933年至1948年）、機構整併與央圖遷臺復館（1948年至1967年）、文化建設與國立各館更名調整（1967年至1999年）、國家圖書館與國立圖書館兩館並立現象（1999年迄今）等五階段論述，以建構橫跨大陸與臺灣時期的國立圖書館機構之百年風華，兼及敘述各時期發展核心與重要政策，以瞭解國家圖書館之歷史使命。

綜觀晚清至中華民國時期國立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的發展過程，作為國家最高位階的圖書館群，除了必須主導或協助國家文獻典藏、全國出版品呈繳，訂定圖書館業務標準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以及承擔國際出版品交換之聯繫與業務執行。另外，在國際化、資訊化時代，對於數位內容、詮釋資料格式、國際書號與新書書目的控制，也是鞏固或者賦予國家圖書館優勢地位的重要基礎。國圖也應在釐清國立圖書館與它之間的區隔關係後，致力於發展核心與重要政策，以承接歷史使命。

關鍵詞：圖書館史、國家圖書館、國立圖書館

第壹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近代對於 National Library 中文多譯為國家圖書館或國立圖書館，兩者通常指由政府公部門經費所支持設立的圖書館，其職能主要是於蒐集國家文獻，編印全國目錄，推動全國圖書館事業，同時擔任圖書館界領導者的角色，¹ 如美國圖書館協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所下的簡單定義：所謂國立圖書館就是由國家所維持之圖書館。另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也曾界定表示：國家圖書館必須是一個負責蒐集、典藏、保護全國文獻，以造福後代的機構。² 那麼對於新式圖書館進入中國，其影響公共圖書館與國立圖書館的創建，又是如何反映在大江大海的歷史的變遷過程呢？

二、研究目的

回顧晚清中國社會推動改革與提升知識的過程，一直到今日的臺灣，圖書館不僅是典藏與流通知識的重要機構，也是醞釀社會思潮動力來源之一。無論是朝向「啓蒙」或者「救國」路線的知識份子，藏書樓、公共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對他們都曾扮演重要知識支援服務。因此，本文以國家圖書館為中心，探討擴及百年來不同時期，陸續建立國立圖書館變遷歷程，建構其歷史發展面貌，並對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其他國立圖書館的任務區隔提出思考。

¹ 曾濟群，〈國家圖書館的組織體制〉，《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6：1（1993），頁5。

² C.K. Sharma & Kiran Singh, *Library Management Atlantic* (New Delhi: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5), p. 216.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取歷史分析法(history analysis approach)、歷史變遷研究與典範(paradigm)研究交互運用，以國家圖書館發展為中心，上溯近代京師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發展，下及 1940 年代後期國立圖書館群成立，以及臺灣在 1999 年出現各館鼎立的現象。在參考資料方面，除運用近人著作，並參考國家圖書館與各國立圖館史相關檔案、政府出版品、學報、年鑑為基礎，以歷史敘事(history narrative)呈現研究過程與結果。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在分析過程之中，以國家圖書館發展為中心，再依館務發展特性，概分近代化圖書館的啓蒙與國立圖書館的籌備（1860 年代至 1933 年）、戰時建館與戰後國立五館的佈局（1933 年至 1948 年）、機構整併與央圖遷臺復館（1948 年至 1967 年）、文化建設與國立各館更名調整（1967 年至 1999 年）、國家圖書館與國立圖書館兩館並立現象（1999 年迄今）等 5 階段論述，³ 以建構橫跨大陸與臺灣時期的國立圖書館機構之百年風華，兼及敘述各時期發展核心與重要政策，以瞭解國立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之歷史使命之區隔。

³ 鄭肇陞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慶 50 周年專刊，提出央圖發展階段依序為：籌備時期(1927-1937)、抗戰西遷時期(1937-1945)、復員時期(1945-1948)、由京遷臺保管時期(1948-1954)、復館重建時期(1954-1983)，〈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16 卷第 1 期(1983)，頁 12-22。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有關近代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館史與國立圖書館館史研究，早期討論主要侷限在抗戰時期（1937-1945），如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83年）、盧荷生，《中國圖書館事業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這些專著主要立論於探究圖書館事業的全貌變遷，對於國立圖書館的職能較少著墨，同時對於國立北平圖書館法理之討論缺乏較為深刻討論。1996年以前，重要論文包括，王振鵠先生，〈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之發展〉，收錄在《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第三冊（臺北市：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4年），以中央圖書館設置為中心，擴及探討近代圖書館事業，歸結出圖書館對文化發展之貢獻集中在包存歷史文化、推廣社會教育與配合學術研究；張錦郎，〈清末的圖書館事業〉，《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卷6期2（1973年）；嚴鼎忠，〈京師圖書館史略-清宣統元年至民國十五年（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卷24期2（1991年）、卷25期1（1992年）則上溯清末與民初京師圖書書等機構之演進，強調晚清對於國立圖書館之設置並非毫無建樹，但在革命動盪年代，學界與社會的期待往往無法落實，以致於必須仰賴外力介入，成為相當少見的國立圖書館經營方式。近年來學界對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史研究，除政治大學以數位典藏方式建置「臺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記錄百年圖書館事業變遷，當代主要專著與論文仍以中國大陸學界出版較為豐碩，如陳力，《中國圖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來新夏，《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陳源蒸、張樹華編，《中國圖書館百年紀事（1840-2000）》（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程煥文著，《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然而，這些論文對於處理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歷史定位與抗戰結束後成立之三大國立圖書館代表國民政府開發西部之意義多略而不論，在史料運用上主要引用臺灣政府機構出版品，缺乏原始檔案之應用。

因此，近年來臺灣學界有關於國家圖書館與國立圖書館史研究，受限於各館館史史料與政府公開資訊有限，除機關自行編印之政府出版品，如《國家圖書館七十七年大事記》、《85 國中圖週年慶專輯》，或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舉辦，「繼往開來—95 週年館史資料展」，目前並無專書將三館之組織與分合問題進行討論於研究。

早期相關研究重要者包括曾經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館長之蔣復璁先生 1935 年撰寫之〈國立中央圖書館〉，《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7：3-4 期，介紹央圖之業務與組織職能，以及選印四庫全書、接收國學書局與接辦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業務；〈國立圖書館的起源與使命〉，刊載於《摺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分析英美法澳等國國家圖書館之任務，強調國立圖書館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世界知識的集中與各類學科知識的集中；〈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回顧與展望〉，刊載於《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7：3 期，以政府法令規章與國立中央圖書館發展為中心討論，分機當時圖書館與時代互動。另外，鄭肇陞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16 卷第 1 期，則詳細敘述中央圖書館與其他國立圖書館之間的分合、競逐關係，大量運用館史史料，內容詳實，但資料出處不甚明確。近 15 年來臺灣學者對於國立圖書館問題，較重要之討論仍著重於國家圖書館之法律位階，以及與其它省立/國立圖書館之關，如 1996 年央圖更名為國家圖書館之後，張鼎鍾，撰寫〈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簡析〉，《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1 期(1996)，直言本次組織條例與最初設計落差大，不僅無法展現國家圖書館領導全國圖書館之格局，新組織之位階與職能在相當程度都受到限制；相對於國圖，當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廖又生館長，則另撰〈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組織適用之始：朱大松館長時期〉，《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2:2(1996)，呼籲政府尊重歷史發展與法律問題，使分館擺脫附屬於央圖之地位。

有關國家圖書館與國立圖書館之間的糾葛，一直是圖書館界關切的問題，2007 年政府部門一度計劃將國立兩館併入國家圖書館體制，因此陳昭珍，〈我國國家圖書館新組織體系與營運及其發展策略探討〉，《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2007)，則針對三館之性質與組織調整，預期問題進行完整的評估，同時提出建議與程序，為本研究在法

理層次的討論提供堅實的論證引述。

第參章 問題意識與執行方法

關於近代中國社會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變遷過程，至少在 1980 年代以前學界多以衝擊與反應(challenge and response)、傳統與現代的對峙(tradition vs. modern)等論述觀點來說明中國的落後，以及西方文明對中華帝國的刺激與引進近代化的貢獻。相對於前述，則以帝國主義研究取向(imperialism approach)，強調西方殖民強權國家以炮艦外交，及其他不公義的手段剝削包括中國社會，造成日後中國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的崛起與挑戰。⁴ 以近百年大陸與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而言，類似的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也逐漸引發學界的探索與再思考，譬如過去探討近代中國圖書館史，各類教科書通常以韋棣華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在 1910 年創建的「文華公書林」視為首座建置的公共圖書館，⁵ 然而如果以中國歷史中心論(China-Centered history of China)的角度重新審視，不僅明清時期藏書家將藏書樓開放供鄉裏文人使用，已部份符合近代公共圖書館的意涵，甚至清王朝在全國建立 7 座四庫全書藏書閣，其中南三閣，即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特別開放提供文人入館抄錄，而使其具有今日國家圖書館典藏文獻與知識傳播的功能性，這些事實早於 20 世紀初韋氏創館前百年以上。因此，本文擬以歷史學討論文基礎，重新檢證過去圖書館史典範概念，破除以中央為核心的思考，藉以思考近代迄今國立各館分立的現象，究竟係制度設計不完備使然，或者是時代因素造成？而國家圖書在此過程中，如何將使命、職能與其他國立圖書館區隔。

本文因採取歷史分析法、歷史變遷研究與典範研究交互運用，同時參考國圖與各國立圖館史相關檔案、政府出版品、學報、年鑑為基礎，最後以歷史敘事方式呈現研

⁴ 有關於西方漢學界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典範移轉過程，請參見美國歷史學者柯保恩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⁵ 吳文津，〈韋棣華與近代中國圖書館發展〉，《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15 卷 1-2 期，(2007)，頁 5。

究過程與結果。在研究執行方法方面，研究進行步驟如下：1.蒐集百年圖書館事業史相關史料與文獻；2.文獻分析與史料爬梳；3.編纂史料與撰寫文稿；4.文稿審核與修正文稿。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近代化圖書館的出現與國立圖書館的籌備

(1860 年代至 1933 年)

1840 年代初期，當中國對外關係尚處於互市與朝貢貿易體制，外國使節駐京問題仍未解決之際，在中國境內的國中之國，也就是各地的外國租借地(foreign settlement)，西式圖書館(library)的出現已經引發另一場寧靜的文化登陸戰。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藏書的觀念還停留在宋儒朱熹所說：「藏書樓上頭，讀書樓下屋。懷哉千載心，俯仰數椽足。」對知識分子而言，藏書不只是作為修身齊家的基礎，也是怡情養性，甚至建構立言、立功的依據。然而，由於缺乏全國性圖書館組織與主權觀念，對於透過圖書館保存國粹、輸入近代文明之功能則尚未成形。⁶

1847 年，耶穌會傳教士梅德爾 (Matharin le Maitre) 在徐家匯創辦天主堂藏書樓。2 年後，英國外僑則在上海創辦當地第一家近代公共圖書館上海書會(Shanghai Book Club)，1851 年更名為上海圖書館 (Shanghai Library)。

近代化西式圖書館在上海的建立對於當時的中國社會並未造成衝擊。反而是在 1860 年代以後，中國與歐美各國接觸趨於正常化，成為國際家庭(international family) 的一部分，西洋知識的引進也從夷務轉變為洋務，186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總理衙門派遣駐外使領館制度逐漸形成，少數使臣及其隨從官員在出洋之後目睹西方政制與文化發展，開始注意到新式人才養成教育，進而影響國內政府官員注意到圖書館的發展，如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與康有為代張之洞撰寫的「上海強學會序」都提到面對西洋新式知識的來臨，中國不宜畫界故步自封，宜仿效西方重要都市之大藏書樓，收

⁶ 王振鵠，〈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之發展〉，收錄在《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第三冊（臺北市：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4 年），頁 202。

藏四庫全書與西洋政教學術圖書。1896年孫家鼎在「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摺」，也建議於北京選擇位置適中之地設置京師大學堂，並且預留空地以便日後興建藏書樓與博物院之用。⁷ 由上述可知，晚清倡議設置圖書館的目的，一則為完備學校教育設施與資源，另外則將它視之為近代化都市與政府體制之重要機構。

官紳的共識，促成19世紀後期至1912年之間圖書館事業的萌芽時期，或稱之為新圖書館運動，⁸ 其重要政策與具體作為包括：1902年清廷詔頒「學堂章程」規範了大中小學圖書行政、職能與人事編制。1903年，清帝國第一座公共圖書館浙江藏書館成立。⁹ 1906年，鑑於日俄戰爭結束後，中國從中央至地方均有學習日本改革之呼籲，因此清廷多次派遣政府官員參觀日本文部省圖書館。¹⁰ 同年正式官辦以「圖書館」為名者，首先見於湖南巡撫龐鴻書的奏章中，呼籲在湖南省會長沙設立公共圖書館。1909年，學部奏請設立京師圖書館，¹¹ 翌年清廷頒布「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其中規定：「京師及各直省省治，應先設圖書館一所。各府廳州縣治應各依籌備年限，以次設立。」¹²

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成立，臨時政府設於南京，當時教育部長蔡元培已有籌辦國立中央圖書館之構想，同時積極在公報中刊登採訪古籍訊息，¹³ 但無實質成效。

⁷ 陳忠倚編，《皇朝經世文三編》卷1，（臺北市：文海出版社，1972年），頁5-1。

⁸ 關於中國圖書館發展的分期問題，1982年王振鵠先生曾主張分為「萌芽時期的圖書館事業」（19世紀後期至1912）、「成長時期的圖書館事業」（1912-1937）、「艱困及復員時期」（1937-1949）、「發展時期的圖書館事業」（1949年迄1982年）。參見王振鵠，〈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之發展〉，頁188-202。

⁹ 張圍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2005），頁9。

¹⁰ 「政界視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3日，版1。

¹¹ 學部圖書館舊藏可追溯至宋元明各朝秘閣。滿清入主中國後，祕閣圖書及歷朝檔案，均由內閣典籍廳掌管。然內閣係政府出納政令之機構，而內府別有昭仁殿及翰林院貯藏圖書，內閣所掌先朝遺書及檔案均堆置庫內，逐漸不復為人所所曉。宣統元年，內閣大庫屋壞，移藏典籍檔案，始為人發現。時張之洞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乃將大庫之遺存，奏請設立學部圖書館。雖所貯數量未豐，然頗不乏宋元孤本祕笈。其後端忠敏采進江南故家舊藏，甘肅大吏解送敦煌經卷，成就民初該館之規模。

¹² 「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學部官報》第85期（1910）。

¹³ 〈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1983年），頁57。

臨時政府後因新當選之袁世凱總統無意南下，遂由前清政府體制調整後的北京政府繼續領導中國。袁氏在晚清被譽為中國的強人，而他對教育政策也多延續晚清以來的改革步調。1915年，教育部設立北京通俗教育調查會，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項，改良社會，普及教育」為宗旨，並頒佈「通俗圖書館規程」，通飭各省縣施行，這也是民國以來最早的圖書館法規。同年11月教育部公布「圖書館規程」11條，規定公共圖書館名稱與設置的條件，更重要的是確定教育部為圖書館事業的主管機關。

1916年經京師圖書館爭取，教育部與內務部同意將立案出版之圖書提供一份交由京師圖書館典藏與供眾閱覽。翌年，該館又爭取教育部同意轉達湖北、江蘇、浙江等三省將所屬官書局出版品捐贈為館藏。由此顯示，京師圖書館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備近代國家圖書館所需之典藏國家文獻、政府出版品之職能。1920年代以後，由於北洋政府熱衷國際合作運動，不少國際聯盟所屬機關專家在1922年以後紛紛來華，如國聯圖書館館長在1922年4月訪問北京。¹⁴ 1924年，以處理美國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成立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議決商提撥三分之一提供北京政府擴充圖書館。¹⁵ 經過兩年的規劃，1925年6月北京教育部公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契約，¹⁶ 首任館長由梁啟超兼任。京師圖書館成立以後，北方圖書館事業匯聚文津。

1926年京師圖書館改組為國立京師圖書館（以下簡稱京師圖書館），這一年該館受教育出版品國際交換局委託，為承受外國政府出版品之機關，凡民國政府收到之外國官書，均交付該館代為笈藏、編目，供眾閱覽。¹⁷ 1928年奉系軍閥所支持的北京政府垮臺後，同年7月京師圖書館奉南京國民政府訓令，改稱北平圖書館，隸屬大學院。翌年再與北海圖書館合併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由曾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擔任，並

¹⁴ 「外交部發駐美使館」，1922年4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北京外交部檔案》，03-38-025-01-010。

¹⁵ 「外交部發駐美使館」，1924年，《北京外交部檔案》，03-12-006-05-007。

¹⁶ 《政府公報》1925.6-12（3293-3497），第3446號。

¹⁷ 袁咏秋、曾季光編，《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傳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30。

在北海附近選定地點興建新館，經費仍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支應，此為中華民國最早以國立為名之圖書典藏機構。

相對於 1912 至 1928 年期間國立京師圖書館幾乎代表中國圖書館事業之首，南方國民政府成立在文教圖書事業管理方面，既缺乏人才，又無長期、穩定的財政預算挹注，因此談不上什麼發展。1927 年 4 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7 月設置大學院作為全國學術及行政最高機關，下設教育行政處，再分為社會教育組、圖書館組，分轄全國社會教育行政事宜。1927 年 12 月，大學院，頒「圖書館條例」15 條，此依條例規定各地公私立圖書館以該館所在地的教育行政機關為主管單位。1928 年 5 月 15 日，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於南京，會中決議籌在首都設國立中央圖書館，¹⁸ 以為全國最高學術典藏機構，並為全國各級圖書館之示範。當時會議並具體提出建館經費來源，以及相關業務法源，如出版品呈繳、國際出版品交換，以及圖書管組織及執掌。然而，實際上，受限於政府經費不穩定，加上政局多變，致使籌備建館過程緩慢。¹⁹ 從 1929 年 5 月國民政府通過開辦經費 50 萬，²⁰ 實際上款項並未完全撥付，職員也是來自各部會兼任。²¹ 如以 1933 年國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私立燕京大學、金陵大學等圖書館藏書均在二十萬冊以上作為比較，1933 年以前的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規劃、經費、人事，仍然停留在理念階段，遠不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甚至其他國立大學圖書館。

¹⁸ 〈館史史料選輯〉，頁 57。

¹⁹ 鄭肇陞，〈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16 卷第 1 期，頁 12。

²⁰ 「南京訊」，1929 年 5 月 20 日，《中央日報》，版 8。

²¹ 「南京訊」，1929 年 5 月 20 日，《中央日報》，版 9。

第二節、 戰時建館與戰後國立五館的佈局

(1933 年至 1948 年)

1931 年，在教育部與美國政府支持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挹注經費下，位於北平天津街國立北平圖書館新館竣工。反觀首都南京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舍，卻連建築經費都無下落。有鑑於此，南京官紳與知識界咸以為政府中樞仍應設置中央圖書館。因此，國民政府乃於 1933 年 1 月，由教育部派蔣復璁先生為國立圖書館籌備委員，籌備中央圖書館。蔣復璁雖具圖書館經營理念，但受至於經費，業務難以開展，初期經費還是透過交通部補助 2000 元。為建立館藏特色、充實中西文研究館藏，蔣復璁曾前往赴北平接收北京政府教育部檔案保管處之留存重要圖書，其中包括漢文 46,000 餘冊，滿文書籍 500 餘冊，清代殿試策 1,000 餘本，撥歸央圖籌備處作為館藏基礎。

1933 年 1 月，教育部派蔣復璁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²² 4 月教育部復派蔣復璁委員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備處）主任，同時訓令籌備處正式成立於南京市沙塘園 7 號，後又增租綦巷樓一幢。1935 增租雙井巷 12 號民房。後來中央研究院將籌備處對面之成賢街 48 號建物出讓，館方遂於 1934 年 5 月底教育部透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Returned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申請補助建築設備等費 150 萬元，並獲得同意。²³ 1936 年 2 月，籌備處正式遷入成賢街 48 號新購館舍辦公，同年 9 月 6 日新館閱覽室正式開放閱覽，²⁴ 初期藏書逾 10 萬冊，分參考、報章、期刊、普通四部分閱覽。至 1937 年，此時央圖籌備處圖書與期刊已經增加到 18 萬冊，同時開放閱覽、參考、報章、期刊、普通書籍等四部份對外服務。²⁵

解決了組織、館舍問題，為了增加館藏，籌備處在 1933 年曾先後接收國學書局經

²² 〈館史史料選輯〉，頁 60。

²³ 「南京訊」，1934 年 9 月 24 日，《中央日報》，版 8。

²⁴ 「南京訊」，1936 年 9 月 7 日，《中央日報》，版 8。

²⁵ 鄭肇陞，〈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頁 12-14。

籍版片，²⁶ 又獲得交通部送印刷所，承攬部分機關刊物印刷。另外，籌備處又接辦原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更名為「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履行國際期刊交換條約。而實踐國際交換則有賴日後配合上海商務印書館合作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為名，成為與外國交換珍籍文獻，充實館藏的重要資源。²⁷ 最後，為落實全國教育會議的決議，1935年行政院召開會議通過「新出圖書呈繳規程」，使得籌備處得以依法徵集全圖圖書，典藏國家文獻，特別是政府官方文書，而國立北平圖書館也與籌備處同屬各出版社、書局送存之圖書館，形成南北雙軌並行現象。同年5月初，呈繳新書目錄，第一期出版。²⁸

一、戰時籌備建館與文化抗戰策略

1937年對中華民國而言，不僅是攸關民族存亡的一年，對於在戰時籌備建館的中央圖書館更是驚濤駭浪的關鍵年代。館方在1937至1939年曾先後編印「防空防毒圖書書目」、「戰時知識書目」、「抗日史書目」，表達圖書館對於戰時之態度。²⁹ 不過，自918事變後，日本侵略中國領土，扶植偽政權已有多年歷史，但做為首都的南京，在8月15日首度遭遇空襲前，各政府機關對於疏散與撤離並未全面性獲得有計畫協助。³⁰ 因此，空襲後籌備處僅將重要圖書封存262箱，運送朝天宮故宮博物院新建庫

²⁶ 國學書局前身為江南官書局，創立於1870年代，後改稱為江南書局、金陵書局，1928年為教育部接管。1937年北平故宮文物南遷，由國民政府指定南京朝天宮作故宮倉庫，尊經閣即將拆除，經再三洽商，才允許將雕版版片移置文廟兩廊，但在1937至1945期間因乏人照料，以致被占住的汪偽組織軍隊當成柴火燃料使用，竟全部燒燬。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滿目琳琅：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年），頁22-24。

²⁷ 此一構想至1941年才完全實現，當時已成立的央圖最後函請上海商務印書館洽辦贈《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計英國4部、美國9部、蘇聯3部，共計16部。

²⁸ 「南京訊」，1935年5月5日，《中央日報》，版8。

²⁹ 〈館史史料選輯〉，頁65。

³⁰ 1931年，瀋陽事變發生，導致華北局勢動盪不安，國民政府考量北平國家文物之安全，下令南遷。1933年，北平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所藏精品，相繼南遷。翌年，北平圖書館亦選擇甲乙庫珍本

房妥藏，至 11 月始奉令西遷，提出重要圖書 130 箱，運送下關輪埠；11 月 23 日押運圖書至武昌，暫寄存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另設辦事處於積玉橋聖安得烈堂。³¹一個月後，在耶誕節前夕 2 周，南京淪陷，籌備處留存在南京之財產全部遭損，遂奉令將機關遷移長沙。此後，籌備處歷經多次遷徙，包括 1938 年 1 月 3 日，遷館至湖南岳陽、1 月 26 日遷往成都、2 月租用重慶上清寺聚興村民房作為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公地點，同時借用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大禮堂樓房作辦事處。

在紛亂的 1930 年代，利用國家力量於戰時成立中央圖書館，在世界各國之中並不多見，但央圖自 1928 年抗戰前迄 1938 年進入抗戰第 2 年，籌備建館已延宕超過 10 年。最後，當局最後考量重慶當時並無大型圖書館，加以遷徙到大後方之學校眾多，各校西遷之圖書數量有限，³² 基於發展學術與研究需求，同時中央政府移駐重慶，亦為西南文化薈萃之地，故有建立分館之必要性。於是館方向中英庚款董事會申請將原南京建館之建築經費先行墊付，再加上教育部與四川教育廳補助少許經費，遂於 1941 年元月完成重慶分館館舍施工，2 月初正式開放，³³ 翌年 2 月初另增闢兒童閱覽室。³⁴

既然是戰時建館，那麼其任務與組織，便與承平時期有所不同。然而，央圖籌備處在南京之經營經驗並不多，所以除按照一般國家圖書館建立徵集、採訪、編目、閱

六萬餘冊，並敦煌寫經，明清輿圖、金石拓片，及重要西籍，運存上海租界倉庫，成立辦事處以典守之。及抗戰爆發，上海淪陷。歐戰既起，國際局勢日漸險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因與美國接洽，並獲得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胡適之協助，將存滬善本選取近三千種，二萬餘冊，分 102 箱，於 1941 年秋起，分為 3 批，交商輪運送美國，次年初全部抵達，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內。

³¹ 基督教聖安德烈堂舊址位於今日武昌和平大道，其主體建築是兩座覆蓋琉璃瓦的中西合璧式宮殿，基督教美國聖公會興建，1915 年落成，目前已遭拆毀。

³² 據 1939 年教育部統計所載，截至 1938 年底止：「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全國共 118 所，其中 14 校受極大之破壞，18 校無法續辦，……在各大學之損失，當以圖書館最甚，以國立學校言，則損失 1,191,447 冊，省立學校 104,950 冊，私立學校 1,533,989 冊」。

³³ 「重慶訊」，1941 年 2 月 1 日，《中央日報》，3。

³⁴ 「重慶訊」，1941 年 2 月 1 日，《中央日報》，3。

覽、圖書館相關新式制度、³⁵ 法規訂定、圖書館研究與教學，³⁶ 以及國際交換業務。³⁷ 另外，還必須進行重要物資疏散、³⁸ 文化抗戰與解決戰爭時期無法持續自海外獲得書籍與統籌大後方圖書研究資源分散的困境，如 1937 年底籌備處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國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以及中華圖書館協會等組成「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編訂《國立各大學各學院書目》，再分向國外徵集圖書，以補救各大學被敵所毀損者，再由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承辦業務。1945 年 9 月國民政府法規修訂，將接受教育部委辦之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納入組織編制。最後，為解決圖書館人才培訓問題，奉教育部命令再籌辦圖書館實習學校，³⁹ 7 月 15 日正式開辦。⁴⁰ 最後，因戰時大後方文教展覽空間有限，因此央圖也承擔文化展覽館的功能，如 1942 年籌辦「泉幣展覽」、「常書鴻的畫展」、郵票展覽會；1943 年辦理白沙閱覽室漫畫展覽、故宮博物院書畫展、西北資源展覽、首屆美術展覽；1944 年舉辦中美英蘇文化交流展；1945 年金石拓片善本展覽。

儘管 1930 年代中國外交、政治、經濟環境相當險峻，以建館為使命的央圖籌備處不僅在戰時保護館藏，有特殊的表現，另外在戰區與日本控制之淪陷區各地藏書樓遭到敵軍大肆破壞與有計畫掠奪之後，也迅速提出文獻保存政策回應。⁴¹ 1940 年元旦，

³⁵ 在蔣復璁領導下，籌備處在白沙鎮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江津實驗區，嘗試設立民衆閱覽室，內附兒童閱覽室，為日後發展兒童圖書館事業建構寶貴實務經驗。

³⁶ 如 1939 年，為教育部陸續編訂與修正法條包括「縣市立民衆教育館設備標準」、「圖書館規程」33 條、「圖書館輔導各地社會教育機關圖書教育辦法大綱」15 條、「圖書館工作大綱」3 章 18 條、1940 年「抑制書價辦法」、1941 年「普及全國圖書教育暫行辦法」。在教育方面，1942 年教育部為謀圖書館事業之發展及便利有志青年之進修，指示央圖籌辦圖書館學補習學校。教學課程計包括：圖書館學通論、編目學、分類法、圖書參考、圖書徵購、目錄學及專題演講。

³⁷ 為避免昆明與重慶之間，輾轉費時，基於便捷起見，乃於昆明螺峰街 88 號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作為戰時國外交換書件之主要據點。

³⁸ 1939 年 3 月 1 日，重慶因頻遭日機侵襲，奉令疏散至市郊各鄉鎮。參考閱覽室本日起結束。

³⁹ 「重慶訊」，1942 年 7 月 6 日，《中央日報》，6。

⁴⁰ 「重慶訊」，1942 年 7 月 9 日，《中央日報》，6。

⁴¹ 江南一帶，自明以來即出現不少著名藏書家，藏書數量既豐，珍本允足稱道。抗戰初期，一些藏書

蔣復璁先生由渝赴港與葉恭綽面商，央圖奉命搜購淪陷區善本事宜，同時採購上海及香港兩地積藏書籍，1月14日蔣復璁先生抵滬與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等商議搜購淪陷區古書事宜，主張「政府在抗建時期，百廢俱舉，於此古文化之精華，必亦萬分著意保全」，要求撥款進行計畫，⁴²並成立「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當時這群愛國志士認為：「國家圖書館之收藏，與普通圖書館不同，不僅須在量上包羅萬有，以多為勝，且須在質上足成為國際觀瞻之目標。百川皆朝宗於海，言版本者必當歸依於國立圖書館，凡可稱為國寶者，必當集中於此。」⁴³由此可見諸人無不認同善本書對一國家級圖書館的重要性，至或建議多方購置能還我民族文化真面目的古籍，也許與抗戰當時提倡民族意識有關。

央圖於戰火下籌備建館，不僅要展現抗敵意志，還得不疾不徐持續完成建館程序，當時國民政府對於蔣復璁之表現甚為滿意，在組織條例尚未通過，便於1940年7月頒贈「國立中央圖書館」門額乙幅，1個月後任命蔣復璁為首任館長。同年，10月5日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令立法院第4屆第194次會議通過「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13條，⁴⁴至16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布，規定執掌、發展目標、組織架構、辦事細則等，⁴⁵其中明定它「掌理關於圖書之搜集、編藏、考訂、展覽及全國圖書館事業之輔導事

世家，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出售先人遺籍，因而善本書逐漸流入滬肆。當時寓居上海的有識之士，深恐此等國家重要文化財淪落異域，於是分別函電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都認為非收購不可，恰巧央圖籌備處有一筆庚款會補助館舍建築經費，教育部便令籌備處運用這筆款項先行蒐購古籍。蔣復璁館長首先赴香港與庚款會董事葉公綽先生洽商，請他負責購買自廣東散出圖書。接著更潛赴上海，與當地關心文獻的目錄版本學專家共同討論收購事宜，決定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用該會名義對外行動，以避敵偽耳目，此後參與實際工作，即張壽鏞、何炳松、鄭振鐸、葉恭綽、徐鴻寶五人，再加上蔣復璁先生坐鎮重慶，大規模的淪陷區古書蒐購取得輝煌成果。

⁴² 〈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書〉，《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1983)，頁76。

⁴³ 〈同志會第四號工作報告書〉，《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頁80-82

⁴⁴ 「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法令案」，1940年10月8日，笈藏於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編號001012071297。

⁴⁵ 「重慶訊」，1940年10月17日，《中央日報》，版3。

宜」，這一條例可說是由國民政府時期公布最重要的國家圖書館組織法規。儘管戰時建館不易，但有了法源依據，加上國民政府令行政院及直轄各機關將黨政各機關刊物送中央圖度藏、國民政府文官處支持續寄各有關書刊以便作為國際交換。⁴⁶ 另外，珍珠港事變以後，中美同盟國關係成形，經濟部駐美技術團主任王守競在 1944 年至 1945 年期間曾多次為資源委員會與央圖選購參考書籍，進行大規模購書計畫，皆使央圖館藏發展迅速。⁴⁷

1944 年後，教育部為回應國民參政會開發西北地區之呼籲，隨即於當年由央圖協助成立國立西北圖書館於蘭州成立。⁴⁸ 戰爭期間央圖重慶分館之閱覽設備、空間，在戰後悉數贈送當地，成立國立羅斯福圖書館；⁴⁹ 3 年後（1948 年）國立西安圖書館也開始進行籌備。⁵⁰ 包括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西北圖書館、羅斯福圖書館、西安圖書館等五大國立圖書館體制形成後，對於各別國立圖書館之設置、職能及其組織有了初步規定。儘管，1940 年代中期三大國立圖書館之設置過程與央圖關係密切，但央圖只被賦予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之功能，在經費、業務與人事交流方面，與各館之間並無從屬關係。

⁴⁶ 「機關刊物送中央圖書館度藏」，1940 年 10 月 18 日至 1947 年 3 月 14 日，箴藏於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編號 001097100001。

⁴⁷ 「王守競函件 S. C. Wang (Shou-Chin Wang)」，1944 年 9 月 22 日至 1945 年 9 月 17 日，箴藏於國史館《經濟部檔案》，編號 0030206000253。

⁴⁸ 1945 年 7 月，政府因財力拮据，該館一度奉令停辦，至抗戰勝利後，1947 年改稱國立蘭州圖書館，兼充國立蘭州大學圖書館。

⁴⁹ 1945 年，國民政府為紀念美國總統羅斯福促進世界和平，創設聯合國之貢獻，決定在重慶設立國立羅斯福圖書館。該館設籌備委員會，由教育部聘請張群、朱家驊、王世杰、陳立夫、胡適、傅斯年、蔣夢麟、蔣復璁、嚴文郁等 20 餘人為委員。

⁵⁰ 國立西北圖書館首任館長為楊鍾健，他與蔣復璁同為 1923 年北京大學畢業校友，當時蔣復璁為哲學系，楊鍾健為地理系。楊氏 1944 至 1947 年期間曾赴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加拿大考察和講學。1948 年至 1949 年擔任西北大學校長，兼任國立西安圖書館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蔡盛琦，《戰後初期中國各省圖書館史料彙編》（臺北新店：國史館，2009 年）。

表 1、戰後國立五館執掌業務之比較表

圖書館名稱	執掌	左列執行業務法源
國立中央圖書館	隸屬於教育部，掌理關於圖書之蒐集、編藏、考訂、展覽及全國圖書館事業之輔導事宜。	「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 1940年9月26日制定。
國立北平圖書館	隸屬於教育部，掌理關於圖書之蒐集、編藏、考訂、展覽及圖書館事業之研究事宜。	國立北平圖書館組織條例， 1946年5月11日
國立蘭州圖書館	隸屬於教育部，掌理左列事宜：1、西北各省古物文獻及有關邊疆史料之保藏。2、西北各省圖書文化事業之輔導。3、各種圖書古物及地方文獻之搜集編藏考訂展覽。	原名國立西北圖書館，1947年2月改稱國立蘭州圖書館，兼充國立蘭州大學圖書館。國立蘭州圖書館組織條例，1948年2月28日。
國立西安圖書館	1946年，教育部感於事實需要，聘請劉季洪等13人籌備國立西安圖書館，復因戰亂關係，工作遭受影響，未正式開放閱覽。	無
國立羅斯福圖書館	該館由籌備處委員嚴文郁兼任秘書，實際負責籌建工作。昔該館組織條例未獲立院通過，在大陸陷落前，一直以籌備處之組織，處理業務。	無

資料來源：編者自行整理

二、戰後復員與國立五館體制的曇花一現

1945年9月9日，國民政府宣佈抗戰勝利，中樞各機構陸續返回首都南京，央圖也於19天後接收戰前南京市成賢街48號之舊有館址。重返南京之路，整整經歷8年之久，但戰後復員所面臨的任務更為艱鉅。

首先是接收敵偽館舍與圖籍問題：央圖為戰後初期國立圖書館五館之中制度、人事最完整、資金最充裕，同時也是唯一在戰時成立，主導國家善本文物搶救之要角。1946年元月，央圖工作人員進入南京接收偽中央圖書館、日本居留民團研究會、陳群收藏之澤存文庫40萬冊圖書，並將陳氏在南京的澤存書庫改做央圖北城閱覽室，⁵¹但原來之館舍之閱覽設備早已遭日人劫掠一空，當時館員自我調侃：「在渝時有屋無書、而今在京有書無屋」。⁵²

在上海方面，央圖也接收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及近代科學圖書館等日人之文化機關圖書，共計接收圖書350,273冊。然而，面對更為廣大的全中國各地敵偽政權下設置之公立圖書機構，以及日本統治殖民地包括臺灣光復後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南方文庫，央圖卻無能力接收。因此，如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在1945年隨統治機構調整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翌年5月合併「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改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迄1973年才更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第二是要求寄存古籍歸還與追討遭掠奪文獻方面，抗戰前由國立北平圖書館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善本古籍，美方一度無意歸還，僅同意將這批圖書拍攝微捲1,070捲提供央圖典藏利用而已。少數成功索回之個案仍然要仰賴政府之大力支持，戰前130

⁵¹ 陳群（1890-1945）為汪偽組織內政部長，他在上海、南京兩地各建造書庫，蘇州亦有一些藏書。大部分藏書是戰時私人與公家機構來不及疏運，由各地方偽組織接收後轉送內政部，他一概照收。所接收藏書中，如趙烈文於清咸豐8年(1858)至光緒15年(1889)《能靜居日記》手稿、宋乾道淳熙間建安王昀甫刊本《尚書》等，都相當珍貴。又如清楊德亨《尚志居集》，具備了著者第一、二、三次刪改底稿本及清光緒九年原刊校樣本，可視為一書從撰稿到出版的最完整呈現，亦屬難得。

⁵² 〈館史史料選輯〉，頁67。

箱存於香港轉運期間遭日軍劫掠轉存日本帝國圖書館內，至 1948 年透過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就終在東京帝國圖書館地下室及伊勢原鄉下搜獲有央圖印記的這批善本古籍，約計 35,000 冊。⁵³ 另外，在接收敵產方面，教育部在戰後迅速發布指令，要求接收上海三井洋行、上海日僑，配合與國防部史政局、⁵⁴ 中信局蘇浙皖區敵偽產業清理處。⁵⁵ 除了大陸與日本，央圖甚至多次聯繫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追查抗戰期間在香港遭劫掠書籍，是否透過日商竹籐峰治輾轉來台。⁵⁶

第三是落實國家圖書館職能與國際交換出版品問題，在蔣復璁館長的擘畫下，央圖除將陳群在南京設立之澤存文庫書庫，改為城北閱覽室。⁵⁷ 南京總館閱覽室正式開放後，亦設有普通閱覽室、參考室、期刊室、日報處及出納處，將重慶戰時建館之經驗，在短暫的承平時期中快速實踐。另外，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也在戰後最短時間內函請各國政府恢復交換關係，⁵⁸ 所得交換品分存西安圖書館(後改為國立西安圖書館籌備處)、國立蘭州圖書館和國立羅斯福圖書館。換言之，央圖業務在 1946 年 7 月底，大致已經回復戰前規模，各項職能發展積極，⁵⁹ 甚至招待國內外漢學專家進行專業交流。⁶⁰

由此可知，央圖在抗戰時期（1937 年-1945 年）將組織法源確定、策劃各類圖書館法規的主導修訂、完備出版著作呈繳制度、擴大搶救國家古籍文獻，以及將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納入組織，加上戰後接收偽政府重要圖書文獻機構，同時協助西安、蘭州和國立羅斯福圖書館之成立，種種計畫與作為都讓它穩居戰後初期國立圖書館界之領

⁵³ 「善本書清單」，國家圖書館，《館史史料》，編號 A0016-A0034。當時歸還第一批清單，計 183 部，2550 冊。

⁵⁴ 「教育部訓令」，《館史史料》，編號 068-192。

⁵⁵ 「教育部訓令」，《館史史料》，編號 068-195。

⁵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函臺灣行政長官公署」，1936 年 2 月 18 日，《館史史料》，編號 A0060。

⁵⁷ 「南京訊」，1946 年 5 月 18 日，《中央日報》，版 4。

⁵⁸ 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臺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1983 年），頁 147。

⁵⁹ 「南京訊」，1946 年 7 月 31 日，《中央日報》，版 4。

⁶⁰ 「南京訊」，1946 年 12 月 6 日，《中央日報》，版 4。

袖地位。特別是掌控出版品呈繳典藏機構與國際交換分配，使其獲得全國性的圖書資源，確立優勢格局。不過，五大國立圖書館的佈局，未久便因中國內戰而消失，甚至國立中央圖書館也一度被整併到其他機構，直到 1954 年重新復館。

第三節、 機構整併與央圖遷臺復館（1948 年至 1967 年）不公開

第四節、 文化建設與國立各館更名調整（1967 年至 1999 年）不公開

第五節、 國家圖書館與國立圖書館兩館並立現象（1999 年迄今）不公開

第伍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不公開

參考文獻

參考資料

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北京外交部檔案》

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

國史館，《經濟部檔案》

國家圖書館，《館史史料》

臺灣省政府，《省級機關檔案》

公報與報刊

《中央日報》

《政府公報》（北京政府）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臺灣省政府公報》

《學部官報》

《總統府公報》

中文專書

袁咏秋、曾季光編，《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傳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30。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滿目琳琅：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年），頁22-24。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滿目琳琅：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年）。

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七十七年大事記》（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10年11月）。

張圍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頁9。

陳忠倚編，《皇朝經世文三編》（臺北市：文海出版社，1972年）。

蔡盛琦，《戰後初期中國各省圖書館史料彙編》（台北新店：國史館，2009年）。

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臺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1983年）。

中文期刊

王振鵠，〈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之發展〉，收錄在《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第三冊（臺北市：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4年），頁188-207。

吳文津，〈韋棣華與近代中國圖書館發展〉，《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15卷1-2期，
(2007)，頁5。

宋建成，〈臺灣公共圖書館史〉，《圖書與資訊學刊》63，(2007)，頁37。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1983)，

國立中央圖書館，「同志會第一至九號工作報告書」，《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
卷第1期，

張鼎鍾，〈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簡析〉，《國家圖書館館刊》第1期(1996)，頁18。

陳昭珍，〈我國國家圖書館新組織體系與營運及其發展策略探討〉，《國家圖書館館刊》
第2期(2007)，頁2。

曾濟群，〈國家圖書館的組織體制〉，《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6：1（1993），頁5。

廖又生，〈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組織適用之始：朱大松館長時期〉，《台灣圖書館管
理季刊》2:2(1996)，頁2。

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市：時英，2009），頁。

鄭肇陞，〈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1983)，
頁12-22。

盧錦堂，〈國立中央圖書館古籍的蒐藏與整理〉，《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6：1（1993），
頁154。

西文參考資料

Cohen, Paul.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Sharma, C.K. & Singh, Kiran, *Library Management Atlantic* , New Delhi: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5.